

民国时期苏南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公共空间

戚晓明 刘春卉 尹秋玲

(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一直是我国百年乡村建设史中的重要内容,其中公共空间对乡村建设而言意义重大。通过对民国时期苏南地区乡村建设运动史料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公共空间主要包括民众茶园、农事展览会/陈列馆(室)、民众图书馆、民众公园与体育健身场等形态,发挥着社会性、教育性、休闲娱乐、文化革新、组织民众等功能。作为一种历史文化遗产,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公共空间的发展实践对当代的启示有:围绕乡村公共生活紧扣群众需求发展空间,结合多元媒介及文化服务挖掘空间的复合多功能,空间建构中社会力量的参与,空间发展中新社会动员模式的生成等;从空间形态、空间功能、空间发展策略等方面为当前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村公共空间、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生动而宝贵的经验。

【关键词】公共空间;乡村建设运动;民国苏南;乡村振兴;文化空间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3)05-0133-10

The Public Space in the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in Southern Jiangsu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QI Xiaoming LIU Chunhui YIN Qiul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Abstract: The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had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content in the century long history of rur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among which public space w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rural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in southern Jiangsu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it was found that the public spaces during this period mainly included forms such as public tea gardens, agricultural exhibitions/exhibition halls (rooms), public libraries, public parks, and sports fitness centers, playing a social, educational, leisure, entertainment,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organizing the public. As 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the development practice of public space in the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s implications for contemporary times, including: closely adhering to the needs of the masses and developing space around rural public life; combining diverse media and cultural services to explore the complex and multifunctional nature of space; the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forces in spatial construction; the generation of new social mobilization models in spatial development; etc; This provides vivid and valuable experien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public spaces and rural culture under the curr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from aspects such as spatial form, spatial function, and spat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收稿日期】2023-0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空间社会学视阈下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变迁与乡村振兴研究”(19BSH059)

【作者简介】戚晓明(1981-),女,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

刘春卉(1985-),男,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

尹秋玲(1992-),女,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

Key words: public space;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Southern Jiangsu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rural revitalization; cultural space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面临内忧外患,乡村社会日益凋敝,传统乡村社会的现代危机日益凸显,“救济农村”“农村复兴”成为当时各界人士深切感受到的重任,于是政府、社会组织、知识分子等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这场运动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持续了十余年之久,贯穿整个民国时期。据南京国民政府事业部调查,到1934年,全国各地乡村建设团体和机构多达600余个;乡村建设实验区、试验点更是达至1000处之多^①。作为社会运动的乡村建设,是以农民为主体、以乡村为本位的社会或文化重建运动,虽然各地的乡村建设事业侧重点和入手处不同,但主旨却都是“从乡村入手,去求得中国问题的解决”“建设一中国新文化运动也”^②。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讲,救济乡村只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乡村建设的“真意义”在于创造新文化^③。从这个层面出发,乡村建设运动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即是改变腐朽落后的民众文化意识,改造乡村大众文化,形成乡村乃至中国发展所需的新文化基础。而公共空间、公共生活是大众文化、地方文化的最好展示和最有力的表现^④,因而本文以公共空间为切入口开展研究,有别于以往对于乡村建设运动的概况、模式、问题、成效及启示^⑤的研究,希望能够进一步丰富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成果。

欧洲和美国史专家对公共场所的聚焦关注已久,如咖啡馆、酒店、酒吧等,在那里陌生人聚集,交换信息,进行社会交往^⑥。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改良者利用公共空间、公共场所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革新和教化。中国学者在研究公共空间、公共场所时受到了西方新文化史、新社会史学派的影响,更加聚焦一般民众、日常生活;在概念界定中也注意与“公共领域”作探讨和区分。公共空间、公共领域在概念中都包含“公共”二字,都强调在“公”这个范畴上。但“公共领域”最早由西方学者提出,是以18世纪欧洲——主要是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历史为背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类似于俱乐部、咖啡馆、沙龙、杂志和报纸等的公众能聚集在一起自由讨论表达公共性关怀,形成制约权力的公众舆论,形成体制化的领域^⑦。美国的中国研究学界就有用公共领域理论来分析清明以来的中国社会^⑧,但也有一些学者持批评意见,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社会是否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尽管如此,中国学界依然受到公共领域理论的吸引,认为至晚从清末开始中国社会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权力场域,既不完全受控于国家权

① 张富利:《新乡村建设、逆城市化与乡土复兴》,《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② 王先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转向及其原因探析》,《史学月刊》2016年第1期。

③ 《乡村建设的意义》,转引自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研究会编:《乡村:中国文化之本》,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页。

④ 王笛著:《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李德英、谢继华、邓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4页。

⑤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朱考金、王思明:《民国时期江苏乡村建设运动初探》,《中国农史》2008年第4期;徐秀丽:《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安徽史学》2006年第4期;虞和平:《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农村改造模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胡玲玲:《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经验对当前乡村治理的启示》,《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等等。

⑥ Sennett R. *The Fall of Public Man. On the Psychology of Capitalism*. Vintage Book, 1977; Duis P. *The Saloon. Public Drinking in Chicago and Boston, 1880—1920*.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3; Rosenzweig R. *Eight Hours for What We Will: Workers and Leisure in an Industrial City, 1870—192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Kathy Peiss. *Cheap Amusements. Working Women and Leisure in Turn of the Century*,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⑦ 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史林》2003年第2期。

⑧ 同上。

力,也不完全受控于某个私人或民间力量,是“公”和“私”两种利益主体进行博弈、协商和调适的空间^①。一般意义上讲,公共空间和公共领域可相互替代使用。但当更加强调公众舆论、权力场域这些特征时,公共领域使用更多,更多体现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公共空间既包括政治活动空间,又包括休闲文化空间、社会交往空间等,既包含物质性场所如公园、茶馆、咖啡馆、图书馆等,又包括具象的如报刊。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公共空间更多指代民众聚集场所,满足乡村民众日常生活需要,体现当时大众文化和乡村地方文化的空间,也可称之为民众公共空间或者公共文化空间。

一、苏南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公共空间

(一)民国前后公共空间的嬗变

1. 19世纪末以来传统公共空间的“祛魅”

清中叶之前,中国社会一直是以农村为主体、城乡一体化的传统社会^②。村落是人们世代生活的主要场所。村落中人们以血缘、地缘为基础、依靠传统的伦理道德宗族礼教联结在一起。寺庙、祠堂、街巷、池塘等成为传统社会中常见的公共空间。其中,又以寺庙、祠堂最具传统社会文化特色,其乃是维持一个乡村秩序最重要的公共场所,也是体现国家意志与民众意志博弈的文化战场^③。而19世纪末以来,随着西方现代科学思想的传入,以报刊为代表的公共话语空间中出现了强烈的反宗教、反寺庙、“破除迷信”的思潮^④,传统社会中的寺庙、祠堂失去了原有的神圣魅力,进入“祛魅”阶段。一些报刊中出现寺庙藏污纳垢的新闻,如《新闻画报》中的“劣僧罪状”^⑤、《点石斋画报》中“看戏轧伤”^⑥“瞽秃争财”^⑦、《图画新闻》中“小沙弥被伤”^⑧等。传统空间在急欲变革的中国社会中失去价值。

2. 民国时期新兴公共空间的生成

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革命中的一个巨大符号,其多样的内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1911—1912年间城市中的开放私园、同乡会馆、街头等公共空间来生成、填充和建构^⑨。“五四”以来新文化思想

① 研究传媒公共领域的代表性论著有刘增合:《媒介形态与晚清公共领域研究的扩展》,《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方平:《清末上海民办报刊的兴起与公共领域的体制建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研究民间社团的代表性论著包括: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研究知识分子和士绅的代表性论著包括:杨海平:《近代中国公共领域与知识分子》,《新闻界》2006年第5期。研究教育公共领域的代表性论著包括:戚少枫、郝延军:《清末教育改革与社会公共领域的扩张》,《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研究文学公共领域的代表性论著包括:郭剑鸣:《文学公共领域:中国近世市民社会的一种雏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等等。

② 李长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页。

③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④ 鞠熙:《民初北京公园理念与传统公共空间转型——以1914—1915年北京城市改造为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⑤ 《新闻画报》,光绪三十四年(1908)2月16日,收入《清代报刊图画集成》,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年,第3册第250页。

⑥ 《点石斋画报》,光绪十年(1884)5月,第6号,第49页。

⑦ 《点石斋画报》,光绪十年(1884)10月,第23号,第89页。

⑧ 《图画新闻》,光绪三十四年(1908)5月28日,收入《清代报刊图画集成》第7册第299页。

⑨ 瞿骏:《辛亥革命时期的集会与城市公共空间——以追悼会为中心(1911—1912)》,《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的冲击更是促进了新兴公共空间的生成,图书馆、公园、书店陆续在城市出现。1912年,时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提出“教育并不专在学校,学校之外,还有许多机关,第一是图书馆”^①。同期,鉴于大多数国民“无缘接受完全之学校教育,知识固蔽、道德堕落”,有识之士高呼“非从社会教育入手,不足以增高人民之智识、改良社会之气象”^②。图书馆在教育部确立的社会机构中赫然出现,同时民众通俗图书馆在民间纷纷建立。同样,西方的公园概念传入中国^③之后,1914年京都《市政通告》通过大量文字介绍了外国公园的相关情况,同年北京的社稷坛改名为“中央公园”并向公众开放^④。民国时期许多公园既是民众旅游休憩的场所,又在潜移默化地发挥教育大众的作用,有的更直接是教育机构所在地^⑤。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代表了新兴思潮向乡村的渗透,由知识分子等主导,在乡村公共空间的构建和改良中也体现了这一时期的整体趋势和特征,即和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一样均受先进思想和现代文明的影响。

3. 战乱影响下公共空间的衰退

民国时期乡村公共空间的发展受到其中长达十余年之久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影响。如前所述,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公共空间充分受到当时新文化思潮、现代文明以及乡村建设运动主体知识分子等的影响,其发展特征与城市新兴公共空间较为相似。空间成为一种策略,为乡村建设运动中实现知识普及、除旧革新、文化改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1937年全面抗战的开始,大部分乡村建设运动实验被迫中断,公共空间也逐步式微和衰退。

(二)民国时期苏南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公共空间

纵览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会发现其模式众多、主体各异、内容多样。而苏南地区汇集了多种力量,举办了不同模式的乡村建设实验,俨然是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区域性缩影^⑥。比如,众所周知的陶行知晓庄试验,是由知识分子主导下的乡村平民教育运动,注重教育与农事、造林、手工、卫生、娱乐等相结合,从乡村教育入手实现改良乡村文化、改造乡村社会的目的;昆山徐公桥乡村改进实验,由民间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导,致力于改造农民生活、改良农村组织、发展农民自治、增加农产数量、推广农民教育和改善农民娱乐等^⑦;南京国民政府主导的江宁县政改革,以户口管理、土地陈报、改良税收、整顿治安、复兴经济等为主;等等。对苏南地区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公共空间进行梳理,基本可以窥探民国乡建中公共空间的一般形态。

1. 民众茶园

中国是茶的故乡^⑧,中国的茶馆自晋唐以来发展迅速,至清代达到高峰。民国时期的茶馆形制是清代的延续^⑨。但在20世纪初,传统茶馆引起了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在推行民众教育、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将茶馆纳入其中。陶行知的平民教育运动中有中心茶园和共和茶园。中心茶园由晓庄师范设置,茶园里设有喝茶处,还有围棋、胡琴、象棋、乒乓球等文化娱乐设施,满足多名农友喝茶休闲的需求。茶园还

① 蔡元培:《何谓文化?》,《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年,第159页。

② 侯鸿鉴:《说社会教育》,《教育杂志》1914年第5期。

③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421页。

④ 鞠熙:《民初北京公园理念与传统公共空间转型——以1914—1915年北京城市改造为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⑤ 陈蕴茜:《论清末民国旅游娱乐空间的变化——以公园为中心的考察》,《史林》2004年第5期。

⑥ 朱庆葆、王科等:《改造乡村中国 民国长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建设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页。

⑦ 朱考金、王思明:《民国时期江苏乡村建设运动初探》,《中国农史》2008年第4期。

⑧ 包树芳:《空间重组与茶馆改良——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众茶园的考察》,《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第1期。

⑨ 同上。

与夜校相结合,晓庄师范的师生和农友不仅在茶园里喝茶闲聊,还讲述各类文化知识、时事新闻。茶园更是举办了评书讲演活动。茶园从七岁的小女孩到七十岁的老太婆都有,邻村未染不良嗜好之青年农友们都到这里听书下棋,茶馆内热气腾腾,融融一室^①。共和茶园则在其倡导的乡村工学团中,农友在茶园中除了喝茶娱乐,还解决公共纠纷,商讨公共事业如修路、组织合作社、举办村民同乐会等^②。徐公桥镇原有的茶馆集休闲、交流、纠纷评理于一体。徐公桥乡村改进会在原来茶馆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把茶馆作为宣传教育学习的阵地。茶馆内设有图书陈列处、书信代写处^③、识字处等,茶馆的墙壁上还贴满了各种具有教育意义的格言和画报,茶馆还定期举办有关农村生活生产常识方面的通俗讲演。

2. 农事展览会/陈列馆(室)

尽管陶行知的平民教育运动主推乡村教育的发展,但其教育确是和乡村实际生活密切联系到一起的。农艺陈列馆就是教育与农业相结合的产物,馆里陈列了农事历程、农业加工、农具改良、农场管理、农民生活等方面的内容^④,宣传了当时的农业知识。一些地方开办了相似性质的乡村艺术馆。徐公桥乡村改进区在农教馆里设置了陈列室,陈列新式农具、农医标本等。陈列室还有专人为村民答疑,对于新农具的使用方法,必要时改进会还派专人实地演示^⑤。江宁县政改革在取缔恶习陋习、改良风俗的过程中将旧有的庙会改成了新式集会,举办种子陈列会、农具展览会等,称旧有庙会存在借庙会之名聚众赌博抽烟等不良现象。江宁县政府认为:“农村缺乏正当娱乐,……与其禁而无效,不如就其固有之习惯,而加以改进,一方面使人民享有正当娱乐,一方面与农民以交换农具观摩农产之机会。余如酬神赛会,吸烟聚赌等之恶习,概在严加取缔之列。”^⑥

3. 民众图书馆

“我国以农立国,国家之根本在于农村。……今后救国方策,拯拔大多数国民之蒙昧与困苦为先务。……至于蒙昧之启发,则民众圉之责也。”^⑦民众图书馆对于增长民国时期农民知识、促进农民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成为乡村建设运动中一类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间形态。陶行知的晓庄师范学校位于南京的晓庄村,希望通过培养乡村师资来改造乡村教育。学校里的学生“只用书,不读书。他们在图书室里看书,不在课堂上书。他们看到书的难处才去问指导员。他们为生活而用书,不为书籍而读书”^⑧。徐公桥乡村改进区为了推广民众教育,提高民众的知识水平,创办夜校和书报阅览室,民众教育工作渐有成效^⑨。昆山教育局于1933年在徐公桥公社上设立农民教育馆,馆内有书报室,摆放各种民众书报,每天上午9点到11点向村民开放。为了方便群众读报,在书报室外,还设立了公共阅报处,张贴时事简报,方便农民及时了解社会的动态^⑩。江宁县在实施社会教育的过程中,在每所学校除了设一间农场以推广生计和教育外,分别设立民众学校、民众问字处、民众阅书报处。

4. 民众公园与体育健身场

历史上,园林都属于私家或官家的。近代以来,西方现代文明进入中国后,公园也兴起了。徐公桥乡村改进会意识到需要有公园以供民众休闲、娱乐,一开始将墓园改为公园,后又在改进会会所前重设

① 夏孟文:《回忆晓庄》,载《陶行知一生》,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133页。

② 朱庆葆、王科等:《改造乡村中国 民国长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建设研究》,第74页。

③ 姚惠泉、陆叔昂:《试验六年期满之徐公桥》,中华职业教育社,1934年,32页。

④ 朱庆葆、王科等:《改造乡村中国 民国长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建设研究》,第45页。

⑤ 朱庆葆、王科等:《改造乡村中国 民国长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建设研究》,第124页。

⑥ 江宁自治试验县县政府编:《江宁县政概况》,1934年,第46页。

⑦ 《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二次年会报告》,中华图书馆协会事务所,1933年,第1-2页。

⑧ 陶行知:《中国乡村教育运动之一斑》,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98页。

⑨ 朱庆葆、王科等:《改造乡村中国 民国长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建设研究》,第121页。

⑩ 朱庆葆、王科等:《改造乡村中国 民国长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建设研究》,第123页。

公园^①。改进会也会在公园里举办教育活动。江宁县政改革则是在推行社会教育的过程中设置了民众公园,作为民众游玩休闲之处。

陶行知的平民教育运动中将农村的荒地开辟出来作为体育健身场所,以石担、刀枪、戟棍、石锁、戈、简易的篮球架、跳高架等作为设施,并定期举行乡村运动会。运动会上插秧舞、锄头舞、挑柴竞走、挑粪竞走、拔河、踢毽子、跳高^②等富有乡村特色的运动项目深受民众欢迎。乡村运动会吸引了附近的农民,参与人群达上千人。徐公桥改进会则在1931年将民众公园以东的区域改作民众体育场,场上配备了简易的运动器具。同时还定期组织运动会,以便“引起民众研究体育,锻炼体格,指导其适当之运动”^③。体育项目包含了球类、田径赛、器械、国技等,参与运动会多至上千人。江宁县在推广社会教育的过程中,在每个学校设立一个体育场推广健康教育^④。

二、苏南乡村建设运动中公共空间的功能分析

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公共空间与乡村建设目标高度一致。作为乡村建设运动中的重要方面,公共空间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社会性功能

乡村建设运动中民众茶园、农事展览会/陈列馆(室)、民众图书馆、民众公园与体育健身场等公共空间的发展很好地印证了空间社会学家苏贾所说,“空间产生于有目的的社会实践”^⑤,这一时期的公共空间是乡村建设运动的产物,为乡村建设服务,体现了很强的时代性和社会性。以茶园为例,这一时期的茶园除了是容纳人们社会交往、休闲消遣的公共领域,还成为乡村建设运动中时事政治、文化知识传播,公共事业商讨、农会组织成立宣传、平民教育学习的重要阵地。在徐公桥的茶馆中,农民在有民事纠纷时会到茶馆“吃讲茶”;乡村改进会也在茶馆内摆放各种图书、图片供农民翻阅,每天早上也有专人“代写代阅书信”“指导难字生字”“解答各项问题”等^⑥;茶馆也会有关于农业生产、农村卫生等知识的讲演。空间不仅被组织和建立起来,还由群体以及这个群体的要求、伦理和美学,也即意识形态来塑造成型并加以调整^⑦。民国乡建中的茶馆与乡建运动有很高的嵌合性,依循着目标而设置,但同时又契合民众日常生活需求、精神文化需求,在具有功能性作用的同时,内化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农事展览会/陈列馆(室)、民众图书馆、民众公园与体育健身场等也是如此。空间本身就是社会活动的构成部分,体现了时代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⑧。

(二)教育功能

无论是陶行知的平民教育运动还是徐公桥的乡村改进,都有将生活教育灌注于日常生活过程^⑨的理念和行动,而公共空间就成为日常生活教育的重要场所。民众茶园、农事展览会/陈列馆(室)、民众图书馆可以发挥识字教育、农业教育、公民教育等方面的功能,民众公园与体育健身场则可以发挥康乐教育、

① 朱庆葆、王科等:《改造乡村中国——民国长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建设研究》,第126页。

② 孔雪雄:《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中山文化教育馆,1935年,第293页。

③ 陆叔昂:《三周岁之徐公桥》,中华职业教育社,1931年,第79页。

④ 朱庆葆、王科等:《改造乡村中国——民国长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建设研究》,第268页。

⑤ Soja, E. The Socio-spatial Dialectic.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0, 70.

⑥ 姚惠泉、陆叔昂:《试验六年期满之徐公桥》,中华职业教育社,1934年版,第32页。

⑦ 勒菲弗:《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6页。

⑧ 林聚任:《论空间的社会性——一个理论议题的探讨》,《开放时代》2015年第6期。

⑨ 小田、郝佩林:《教育救国的日常路径:对徐公桥改进试验的考察(1926—1934)》,《中国农史》2017年第1期。

体育教育、素质教育等方面的功能。农友们在民众茶园喝茶聊天的时候,与知识分子在一起交流时事、农事、社会、体育等,农友们因此接受到直观的公民教育。农事展览会/陈列馆(室)通过对农具、良种、农作物等的展览、陈列以及知识分子对农业新技术产品的推广介绍,极大地增加了农民在农事生产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徐公桥乡村改进实验中“富教合一”的主张推动了农事教育、农事展览的发展。只有农村农事生产增加、农民生活改善,农家子弟才有可能入学,改良农作、自治自立^①。农事展览会/陈列馆(室)在对农事展览、推广的过程中将农村经济与农村教育结合起来,随富随教,即富即教^②。而民众图书馆本身就是个农民增长知识、接受教育的地方。1933年徐公桥镇上的书报室就位于农民教育馆内,是农民教育馆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教育的功能直接体现在馆名上。民众公园和体育健身场则是作为康乐、体育教育等的空间,丰富了民国时期的农民生活。

(三)休闲娱乐功能

作为公共空间,休闲娱乐功能是最基础的。以茶园为例,据《中华文明大辞典》所述,茶园即是“供顾客饮茶、吃茶点兼休息、娱乐的场所”。宋代时期茶馆开始增添唱曲、说书、下棋等娱乐活动,其休闲娱乐功能在《梦粱录》《夷坚志》《武林旧事》《松漠纪闻》中均有记载^③。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民众茶园更是除了喝茶,还添加了象棋、围棋、乒乓球、胡琴、评书讲演等文化娱乐活动。有书记载民众茶园设立的宗旨是改良民众休闲生活、提倡正当娱乐、促进社交精神^④。农事展览会/陈列馆(室)更是如此,在当时农民缺乏正规娱乐的情况下给予农民观摩参与的机会,展览会期间的各种戏剧表演、竞赛活动更是增强了其趣味性、休闲性、娱乐性。而民众图书馆和体育健身场则通过提供读物、举办读书会、提供运动健身器材等极大地丰富了农民的文化娱乐生活。近代民众公园的建设标志着西方现代文化娱乐形式、生活方式在中国的渗透,它主要是为都市人提供休闲和娱乐的载体^⑤。乡村建设运动中民众公园这一体现现代性、都市化的休闲娱乐载体被带进农民生活中,为乡村带来现代文明。

(四)文化革新功能

陶行知的晓庄师范办的中心茶园和夜校结合,不仅为民众提供休闲娱乐交流的场所,还成为除旧革新、防止子孙赌博^⑥、开导思想、传播文化的好去处。徐公桥通过公共空间开展的各种文化娱乐活动,使得民众闲暇时有去处。民众在这些空间里交流、学习新知识、文化,参与各类积极向上的比赛等,使得原有烟赌成风的旧习气得以改变,恶风陋习得以大大改善,文明乡风得以形成。江宁县政改革通过取缔滋生陋习恶习的旧有公共空间如庙会,建立新型的公共空间如农具展览会、种子陈列会等,同时辅之以明文规定,使得江宁长期以来的赌博吸烟、抢嫖等不良恶习、风气得以好转。值得一提的是,乡村建设运动中伴随着新文化的传播,公园、图书馆、展览室等现代化的公共空间建设起来,这些现代化的公共空间对乡村社会产生了强烈冲击,例如农民在图书馆通过简单的阅读实现了与外界世界的互动,在思想与灵魂深处开始对自身所处的生活世界产生疑问、好奇。不仅如此,这些公共空间的建立还为报刊、图片、电影、标本等媒介的进入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支持,依托于空间的这些颇具现代性的新媒介开始介入对乡村文化空间的书写与想象中。由此,知识分子将现代文明带进了乡村,通过空间策略实现了知识普及、除旧革新、文化改革的作用。

(五)组织民众的功能

民国时期民众的自我组织程度不够高,这是内忧外患背景下农村经济社会秩序瓦解和破败的重要原

① 李静:《徐公桥试验区乡村社会教育研究》,《终身教育研究》2017年第4期。

② 江问渔:《富教合一主义》,《教育与职业》1929年第108期。

③ 刘清荣:《中国茶馆形制、功能的演变与前瞻》,《农业考古》2009年第6期。

④ 陈礼江:《民众教育》,正中书局,1937年,第87页。

⑤ 王确:《茶馆、劝业会和公园——中国近现代生活美学之一》,《文艺争鸣》2010年第13期。

⑥ 陶行知:《晓庄试验乡村师范的第一年》,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10页。

因。而乡村建设尤其是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目标,便在于通过知识分子对农村农民的思想与教育改造,让农民能够在村社内部形成强有力的自我组织以及生产乡村内生的有活力的经济文化秩序的能力。从最终结果来看,民国时期的乡村公共空间建设以及与其相关的活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组织民众的功能。以茶园为例,乡村建设运动的主导者除了在茶园里开展活动,如陈列图书、指导民众识字、定期开展讲演等,还要在茶园商讨公共事业、组织合作社、举办村民同乐会、组织乡村自治会、改良家事等^①。茶园可以是负责人集会、结交农友、组织创办农会的重要场所。再以农事展览馆为例,20世纪30年代的农事展览馆在农业技术推广、农事改革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吸引了大批农友的参与,起到了一定的组织功能。相应地,民众图书馆、公园、体育健身场则成为读书会、音乐会、纳凉会、运动会等开展的空间,在民众组织、社会整合、重塑地方话语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苏南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公共空间发展对当代的启示

结合既有文献资料,乡村建设运动作为近代中国乡村发展史上的一场重要的社会改良运动,其中的公共空间对农村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组织建设等方面有整体的推动效用。纵观民国乡村公共空间的发展实践,其对当代的乡村建设尤其是乡村公共空间建设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围绕乡村公共生活发展公共空间

民国时期的乡村面临着内忧外患,传统农业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发展缓慢、日渐衰弱,农民收入持续下降,农村公共事业荒废、动荡不安,乡村建设运动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公共空间正是这场运动产生的具体实践形式。尽管一些空间如茶馆之前就有,但其在这一时期的具体形态却带有明显的时代重构性。换句话说,这一时期的公共空间带有显著的社会建构性。而这种社会建构则是紧密围绕乡村公共生活展开的。首先,传统公共空间得以拓展和提升。以茶馆为例,茶馆自晋唐以来发展了若干年,到清代达到鼎盛,茶馆成为民众休闲娱乐、社交的重要场所。民国乡建中的民众茶园正是在传统茶馆的基础上结合民众的生活、需求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的目标而形成。民众茶园在当时为民众休闲交流、开导传播新思想、摒除恶风陋习、解决公共矛盾纠纷、商讨农村公共事务等提供了场所。民众茶园还被注入图书画报、围棋乒乓球、通俗讲演等新的元素,其公共空间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展、完善,实现了传统空间的现代创新与改造,成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传播的重要空间载体。第二,现代公共空间被建构和利用。展览会/陈列馆(室)、民众图书馆、民众公园与体育健身场等这些带有现代性元素的公共空间在乡村建设运动中被知识分子及民间组织等带进农民的生活中,并且被建设得与农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如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农事展览会/陈列馆(室)、与农民体质增强相关的体育健身场等,为广大农民所接受和喜爱,农民参与率较高。第三,传播新生活理念和文化的公共空间被构筑。民国乡建中的这些公共空间往往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其形式或来自传统乡村或嫁接于现代都市,其内容上与农民生活密切相关,教给农民科学技术、新知识文化、文明新风尚等,处处体现了当时最新的生活理念和文化,也反映了知识分子、民间组织、政府对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的新理念。

(二)从传统空间的单一功能向复合多功能发展

固有思维中,空间的建构往往只具有单一的功能,例如茶馆就是用来喝茶的,图书馆就是用来看书的。但是,个体的需求和社会建设的目标是多样化的。于是,民国乡建中的公共空间呈现出从单一功能向复合多功能性发展。这点对于当代公共空间的提档升级具有较大的启发作用,也能从当前一些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中窥探出来。一方面,民国乡建中的公共空间通过多元媒介实现了空间的复合多

^① 朱秉国:《民众教育概论》,大东书局,1933年。

功能性。这些多元媒介包括民众茶园里的围棋胡琴、图书画报、通俗讲演、村民同乐会等,也包括农事展览会中的戏剧表演、民众图书馆里的读书会、民众公园的音乐会等。通过多元媒介重新塑造了原本的公共文化场域空间,使民众在场域空间内获得了多元的文化体验,从而吸引更多民众的参与,促成人与文化空间的共在、共享及共生^①。另一方面,民国乡建中的公共空间通过多元文化服务实现了空间的叠加。民众茶园通过提供文化娱乐设施、图书画报、书信代写、评书讲演等多元文化服务集休闲、交流、教育、纠纷调解等多重功能于一身。农事展览会/陈列馆(室)通过提供专人答疑解惑、实地演示、茶艺表演、戏剧表演等多元文化服务而集乡村教育、农事改良、农村娱乐等多重功能于一身。多元文化服务搭建起社交平台,形成人与书、人与文化、人与人的连接,从而构筑了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文化空间,它不仅是人际交往平台,还是思想共生、文化创意平台^②。类似地,民众图书馆、民众公园、体育健身场则成为读书会、音乐会、纳凉会、运动会等开展的空间。空间的复合多功能性好似将不同性质的空间(娱乐区、社交区、教育区、纠纷调解区、生产区等)叠加到了一起,在同一空间同时呈现,实现了空间叠加。空间叠加可以满足民众不同层次的需求,甚至激发他们原本并未意料到的个体需求^③。

(三)多元主体参与公共空间的建构

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公共空间如房前屋后、田间地头、家庙祠堂等大都是和乡土社会生产生活以及宗法伦理相关并自发形成的。现代社会中的公共空间则更多呈现出政府的主导作用,与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及“文化下乡”政策等相关的公共空间层出不穷,空间的社会性、政治性特征较为明显。而民国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公共空间的构建则更多体现了社会力量的参与,这和乡村建设运动的发起主体密切相关。如前所述,民国时期苏南乡村建设运动主要由知识分子、民间组织等社会力量发起,也有政府主导。民国时期不同政治势力对国家权力的争夺客观上带来了社会自治力量活动的空间,社会力量在权力的真空地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④。可以发现,乡村建设运动中不同地区开展的主体、内容都各有差别,各种思想流派都能找到一席之地,传统与现代、民主与科学、问题与发展等各类话语与制度实践^⑤都有其暂时性的空间。因而,公共空间在这一时期在社会力量的介入下呈现出社会性、教育性、文化革新等多重功能。无论是陶行知的晓庄试验,还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乡村改进实验,都打破了依赖国家权力的变革模式,并未按照统一的制度程序进行,在公共空间的构建方面也充分结合了各地乡村的实际情况,获得了乡村民众的广泛支持、信任和接纳。民众茶园、农事展览会/陈列馆、图书馆、民众公园、体育健身场等受到乡村民众的欢迎,民众参与积极性和参与度较高。较之国家强权推进,知识分子、民间组织等社会力量下乡的手段更为温和,更易与乡村内部的要求和动力相契合^⑥,更易为民众接受。在社会力量的介入下,公共空间更符合民众的需求,从外力推动转变为乡村民众自身所需的事物。

(四)新的社会动员模式依托公共空间而产生

民国时期苏南乡村建设运动中公共空间的形成改变了传统社会自上而下的动员模式,乡建主体可以借助于公共空间这一平台向民众传递乡村建设的理念、观念、方法、内容等。在这一过程中,公共空间中嵌入的报刊、戏曲、图片、读书会、展览会、同乐会、沙龙等对新社会动员模式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这些与知识分子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的介入密切相关。他们进入公共文化领域中,通过在空间中嵌入这些现代文化方式,不仅丰富了公共空间的内容,而且重建了当时的社会传播生态。基于此,乡村

① 苟爽:《情感共鸣:文化场景建构的内生动力》,《中华文化论坛》2018年第4期。

② 马永强、吴艳丽等:《从“读者小站”看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价值》,《出版发行研究》2022年第2期。

③ 唐晓睿:《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理论溯源与创新——以城市文化阅读空间为视角》,《中国出版》2023年第11期。

④ 武建强:《“公共空间”形成的社会条件及价值意蕴——基于我国民国早期历史为中心的分析》,《求索》2012年第2期。

⑤ 同上。

⑥ 徐勇:《利益与体制:民主选举背后的变数分析》,载《徐勇自选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04页。

建设运动的主体和乡村民众可以在公共空间中陈述观点、针砭时弊、展示风采,进而以思想引领乡村社会^①。在此过程中,社会动员模式由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直线型转变为上下结合的互动式^②。乡村建设运动的主体可以依托公共空间进行社会动员,乡村民众也可以依托公共空间发出自己的声音,对社会动员进行回应。此外,依托于公共空间形成的农民合作社、村民同乐会、读书会等,更是彰显了群体自治动员机制的形成。这些农民的自治合作组织在乡村建设中作用非常重要,对于农民的生产活动、文化活动的开展以及乡村共同体的形成均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空间成了群众性自治组织形成和活动的载体,催生了群体自治动员机制的形成。

结 语

民国时期苏南乡村建设运动中公共空间发展的实践表明,公共空间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其表现出来的特征尽管具有历史的延续,但同时也具备很强的时代性和社会建构性。公共空间成为民国时期乡村建设主体推进平民教育、移风易俗、文化革新、农技推广、组织民众等的空间策略。优秀传统文化在保留的同时,现代性的文化元素如电影、标本、报刊、图片、音乐会、读书会等被赋予公共空间中。乡土特色被保留的同时,都市文明如公园、图书馆、展览会被带进公共空间的形态建构。尽管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公共空间仍然是由乡村建设主体即乡村的外部力量推动建构的,但并没有呈现出一种被动改造的现象。乡村建设运动的主体在推动公共空间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了乡村民众的需求,紧紧围绕乡村公共生活和各地区的实际展开,并且通过多元媒介与多元文化服务丰富了原公共空间,使得空间功能叠加的同时重建了社会传播生态与社会动员模式,推动了当时的乡村民众的生产生活与文化建设,有助于乡村凝聚力和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形成。

当前,中国社会面临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快速推进,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交织渗入乡村,城乡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各种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频繁,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③,乡村公共文化面临着主体缺失、政府公共文化供给失衡、传统乡土文化价值认同危机、传统公共空间衰败、消亡,现有空间功效低下等问题^④。作为大众文化、乡村地方文化发展状态在空间上的投影^⑤,乡村公共空间无疑成为当前践行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抓手。而民国时期苏南公共空间的发展实践则从空间形态、空间功能、空间发展策略等方面为当前的乡村公共空间建设提供了生动而宝贵的经验。据此,紧扣乡村公共生活、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在多元文化服务中实现空间的多功能性、探索外源性嵌入和内源性发展相契合的乡村公共空间重塑路径,使乡村公共空间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全面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新动能。

(责任编辑:李良木)

① 傅才武、何璇:《近代公共文化领域的形成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艺术百家》2015年第3期。

② 同上。

③ 朱媛媛、甘依霖等:《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人居文化环境质量演变驱动机制研究——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地理科学》2018年第11期。

④ 朱媛媛、罗源等:《城乡要素交互作用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演变及机制研究——以河南舞阳县柴庄村为例》,《地理科学》2023年第5期。

⑤ Jones R D, Heley J. Post-pastoral? Rethinking relig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space.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6, 45.